

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 (RTÉ)
2008年度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

爱尔兰人与中国

CHINA AND THE IRISH

杰鲁莎·麦科马克 主编
王展鹏 吴文安 等译
王展鹏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RTÉ）

2008年度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

爱尔兰人与中国

杰鲁莎·麦科马克 主编

王展鹏 吴文安 等译

王展鹏 校

人民出版社

CHINA AND THE IRISH

First published 2009

By New Island

2 Brookside

Dundrum Road

Dublin 14

Copyright © RTÉ

本书由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通过爱尔兰驻华使馆授权,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10-5035 号

译者序言

王展鹏

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09 年中爱建交三十周年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邀请爱尔兰汉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和长期从事中爱文化、商务交流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记者和企业家以“爱尔兰人与中国”为题举办了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讲座播出后，在爱尔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引起热烈反响。2009 年，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新岛出版社将讲座内容汇编成《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出版了本书英文版。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为本书的出版发来了贺信，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为本书撰写了后记。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受爱尔兰外交部委托在华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

001

从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历史看，爱尔兰的小国地位及其与英国学术出版界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特殊关系，使之在有关中国的知识问题的大多数领域扮演了消费者而非制造者的角色，只是在历史上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一些特定领域出版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研究取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总体上看，在 1979 年两国建交前，爱尔兰学术界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译者
序
言





1979年，中爱建交后，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步。政治关系发展良好，双边贸易额从515万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70.7亿美元。爱尔兰在华投资始于1989年，目前已有300多家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一些中国公司也在爱尔兰设立了办事处或欧洲地区总部。中爱民间交往日益频繁，旅爱中国留学生已超过一万人。两国间的互利合作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爱尔兰通过参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起飞，由当时欧盟共同体最贫困的成员国上升为按人均GDP计算的欧盟第二富国，爱尔兰人开始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界定自身民族身份的进程。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与爱尔兰的政治、经济、社会交往日趋紧密，为爱尔兰中国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即是爱尔兰学术界在这一背景下推动中国问题研究的一次积极努力。本书主编杰鲁莎·麦科马克博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长期在华任教。全书11位作者撰写的文章勾勒了自爱尔兰独立建国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至今，爱尔兰人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和当代双边文化、商务交流的现状，部分文章也涉及双方思想的相互影响、发展模式的借鉴等内容。其中包括中英外交史上马戛尔尼伯爵觐见乾隆皇帝、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赫德爵士的在华经历、爱尔兰在华传教士的工作、庄子对王尔德思想的影响、双方的音乐、园艺交流、爱尔兰人对中国城市化、商业文化的理解以及爱尔兰中国移民的生活状况等。

通观全书，《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表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关系为主线的外交史著作，而更多的是通过学者的文献研究和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对广义的爱尔兰人与中国间的文化、思想、社会联系作出历史叙述，

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的致辞

爱尔兰和中国间的关系源远流长而又引人入胜，尽管其中许多内容很久以来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最令人惊讶的并非这一关系年代之久远，而是其内涵如此丰富多样。正如汇集了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RTÉ）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的本书所展示的那样，这一关系既包括外交往来、深度商业联系，也包括音乐传统的神会相通；既包括文学上契合交融，也包括异国植物的引进栽种。中国与爱尔兰都曾有过复杂而又动荡的历史经历，都格外珍视自己的历史遗产；近几十年来都经历了从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繁荣发展，国际合作的规模不断扩大。

今年，中爱两国庆祝爱中建交三十周年。编撰、出版本书，回顾两国关系的悠久历史与紧密联系正当其时。两国在这三十年间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少可以说，我们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得益于中国经济的繁荣，爱尔兰在华企业蓬勃发展，爱尔兰消费者也从中国制造业的巨大产出中获益良多。同样，爱尔兰也接纳了数以万计的年轻、勤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他们促成了爱尔兰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分享了这一增长的成果。过去十年的情况尤其如此。

我在1997年曾作为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副校长访问过中国。2003年，我有幸以爱尔兰总统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在那次成功的访问期间，我说过，我们期待着，不仅将致力于寻求经济繁荣的机会，而且要寻求增进友谊和相互间文化了解的机会。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高度的相互依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展望未来，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员，拓宽和加强各国间，包括中爱两国间的相互联系至关重要。这也是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出版本书和举办托马斯·戴维斯系列讲座等工作的重要性所在。我希望，随着爱中关系的深入发展，更多的推动两国间联系与交往的努力能够不断涌现。

爱尔兰总统

玛丽·麦卡利斯

2009年1月16日

更多的是个人的历史。但无论是历史叙述还是当代问题的讨论，作者始终关注其所反映的宏大时代背景的变迁及其与当代中国和爱尔兰社会的联系。

其次，由于爱尔兰独特的历史文化经历，本书在爱尔兰人身份问题上作了最为宽泛的界定。因而，多篇文章涉及的历史人物（主要是爱尔兰独立建国前的历史人物，如马夏尔尼伯爵、赫德爵士等）既是爱尔兰人也是英国人。尽管如此，作者仍探讨了爱尔兰民族特性或在爱尔兰生活的经历对他们在华活动的影响（例如，赫德爵士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 40 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爱尔兰传教士在中国教会本土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等）。

再次，由于爱尔兰特殊的历史经验，其学术研究既有西方主流传统的印记，又有鲜明的特色。爱尔兰人后殖民经历中关于世界与民族、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民族独立及国家建构等命题的思考，使之在看待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大国又不同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特视角。例如，奥利里博士提出，赫德的爱尔兰血统是其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爱尔兰民族历史形成的多重身份的复杂性、注重家庭、关系乃至多少有些裙带作风的传统和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元素产生了共鸣。与英国主流话语中居高临下的殖民心态的解读不同，这里的赫德形象不再是一位文明的西方绅士在教化野蛮的东方人，而是更多地以平等的心态融入了中国社会。爱尔兰学者还注意到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威廉·罗素、莫洛尼、欣德、柯蒂斯等几任爱尔兰裔爱尔兰圣公会/英国国教会主教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教会走上独立自主、自我发展的本土化进程，发挥了传统天主教和其他新教教派之间的桥梁作用。爱尔兰自身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在这些爱尔兰主教的思想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爱尔兰历史和文化经历的复杂性使其文化心理中既有昔日大英帝国殖民者的痕迹，又有被压迫民族追求平等的愿望。这也成为爱尔兰中国学探索自身学科身份努





力中的一个新取向。

最后，本书作者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研究或对中爱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和现实有切身的感受：其中既有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多年从事中爱文化、商务交流的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文章大多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既可作为国际关系、爱尔兰/英国研究、海外汉学等领域的参考书，也可供对上述领域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

可以说，《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是近年来爱尔兰中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将对方兴未艾的爱尔兰中国研究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昭示了爱尔兰中国研究的良好发展前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历史进程的深入，中国对爱尔兰人而言，重要性日益增强，同时爱尔兰民族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正在经历重新塑造自身身份认同的过程，也需要在两国的深入交往中，通过自身视角，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而，正如本书作者所力图揭示的，爱尔兰人对中国的了解将伴随其对自身文化观念和历史经历认知的建构过程而不断深化。

2009年7月爱尔兰外交部设立“中爱关系”研究项目，《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中文本的出版被列为项目子课题之一。在此过程中，爱尔兰驻华大使戴克澜先生和使馆一等秘书何莉（Therese Healy）女士在项目设计、资金支持、版权联系等方面一直对我们的工作提供精神上的鼓励和具体的支持。英文版出版方爱尔兰国家广播公司/新岛出版社为推动中爱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知识界的交流与对话，慨然允诺无偿向人民出版社提供本书中文版的版权。本书主编杰鲁莎·麦科马克教授长期致力于推动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发展，特别是在促成这一翻译项目过程中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第七代罗斯伯爵布伦

丹·帕逊先生、圣高隆庞会、伯特·范迪吉克先生、财富控股中国、李昊先生等诸多机构和个人慷慨允诺本书无偿使用其收藏的艺术品或摄影作品的图片。

我们要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科研处等管理机构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将中爱关系研究项目列入学校 211 三期 II 类项目，对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诸多支持和帮助。

人民出版社作为国家出版社以推动中爱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交流为己任，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工作。本书责任编辑崔继新先生在本书的选题、编辑等环节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专业上眼光敏锐，文字上精益求精，使本书增色不少。

《爱尔兰人与中国》一书涉及时间跨度大，史料内容广，我们有幸有一支热心中爱文化交流、精通中英两种语言的翻译队伍，经过近一年的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这一翻译项目。本书翻译工作的具体分工如下：

王展鹏（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爱尔兰总统麦卡利斯致辞、第一章、第六章（部分）、第十章、后记，全书审校、定稿

吴文安、尹力静（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第二至五章

庞绪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第六章

罗来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七、九章

王荣华（财富控股中国）：第八章

马婧（爱尔兰驻华使馆）：第十一章

伦敦大学陈慧珊博士校阅了第八章的译文，并就部分音乐术语的翻译提出了修改意见。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硕士生李善成承担了部分体例统一、修改和编务工作。许多长期关心中爱学术、文化交流的师友和同行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Contents

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的致辞 / 1

译者序言 / 1

第一章 中国镜像中的爱尔兰 杰鲁莎·麦科马克 / 1

第二章 帝国龃龉——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伯爵的英国使团
马啸鸿 / 13

第三章 清廷爱尔兰人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在中国
1854—1908 理查德·奥里里 / 25

第四章 从馅饼王奥到傅满洲——爱尔兰、中国及种族主义
芬坦·奥图尔 / 40

第五章 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中国哲人 杰鲁莎·麦科马克 / 54

第六章 三代罗斯伯爵的中国植物情 布伦丹·帕逊，第七
代罗斯伯爵 / 68

第七章 英雄主义与热情——爱尔兰赴华基督使团的先驱 帕特
里克·科默福德和理查德·奥里里 / 77

第八章 东西音乐之神会——酋长乐队在中国 陈慧珊 / 93

第九章 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 理查德·巴瑞特 / 107

第十章 中国的城市规划——大城市及其未来 波琳·伯
恩 / 117

1

目
录



第十一章 旅居爱尔兰的中国人	吕奥达安·麦克·科
梅克 / 128	
后记 为纪念中爱建交三十周年而作	戴克澜 / 141
撰稿人简介 / 146	
本书部分术语中英文对照表 / 150	

第一章

中国镜像中的爱尔兰

杰鲁莎·麦科马克

多年来，爱尔兰人看中国就如同拿反望远镜的观察者那样：视野所及的中国不仅陌生、怪异，而且似乎遥不可及。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切都已改变。我们不妨认为这一改变始于2008年5月12日，一场大地震给中国西南成都附近地区带来了巨大破坏，吞噬了7万人的生命。随之永久改变的是爱尔兰人眼中“中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国度”的观念。爱尔兰人对这样的悲剧并不陌生，我们的心已经和中国人民紧密相连，我们关注着那些失去家园、亲属，特别是那些失去唯一子女的人们。

2009年前后世界经济突然令人震惊地陷于崩溃。这场危机再次证实了建立这一新观念的紧迫性。在探究这一危机发生原因的过程中，爱尔兰人再次深深感受到当今世界国家间的关系如此密不可分：经济法则不再受到国家边界的制约；一国经济的崩溃意味着其他国家也无法独善其身。爱尔兰作为一个规模较小、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正在从这一切中获取实实在在的经验教训。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如果它意味着我们开始意识到爱尔兰的未来发展必须是在一个新的全球共同体范围内进行，那么，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正在成为我们最有价值的伙伴之一。

001

第一章
中国镜像中的爱尔兰





为什么我们历经如此长久的时间才得到这一认识？原因有二：其一，爱尔兰自 1922 年独立建国以来就主要专注于自己的内部事务；其二，大多数爱尔兰人迄今只是从孤立的海岛小国的经历出发来认识中国的。他们可能已到过比尔城堡的花园，或许只有那时才了解到花园中有多少树木、有多少奇花异草来自中国。他们或许曾在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面对玉册和精美的龙袍惊叹不已，但并不知晓乾隆皇帝与爱尔兰之间的联系。或者，他们就在家门口曾遇到过几位中国人，目前，居住在爱尔兰的中国人超过 16 500 人。然而，人们能从这些各式各样的经历中发现怎样的联系呢？他们又能怎样将这些经历联系起来呢？

就在不久前，爱尔兰人对于这样一个看来非常遥远的国度还难以产生持久的兴趣。今天，尽管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中国对我们这些身处爱尔兰的人们而言，还有许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当然，鉴于两国间的巨大差异，对它们做简单的比较看起来多少有些荒谬。仅以人口数量而言，中国有 13.4 亿人，这意味着，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相比较而言，中国一个不大的城市容纳下爱尔兰岛上的六百万人口仍绰绰有余。然而，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和爱尔兰又有着惊人的可比性。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而其中又都不乏动荡的岁月。两国都珍视自己的历史遗产，并努力将其融入今天的实践。两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都实现了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或许甚至包括后现代）文化的转变。最后，作为实现富裕时间不长的国家，两国都要面对共同的难题，都在寻求自身关于中国人或爱尔兰人身份的定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然而，一个世纪以来的动荡促使中国努力探索关于自身及其文化的新模式。同样，我们爱尔兰人正在积极地重新界定自身的身份认同。不久前，我们中的许多人还不愿将北爱尔兰人视为“爱尔兰人”。而如今，北爱尔兰已被纳入“大爱尔兰”的概念，这也促使本书安排了关于马

夏尔尼伯爵的章节：他出生于安特里姆郡并在那里长大成人，后来毕业于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本书的第二章讲述了马夏尔尼伯爵率领英帝国使团于1793年首次朝见乾隆皇帝的经历。罗伯特·赫德（1835—1911）也来自安特里姆郡，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担任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的非凡之处在于能够在英国和中国上司中左右逢源，同样赢得了信任。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赫德将其本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引进到中国，特别是他所热爱的音乐。无论从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视角看，赫德在各个方面都堪称绅士精神的楷模：西方人称赞他在复杂国际事务中展现出的娴熟的外交技巧，而中国人则为他廉洁、正直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折服。

重要的是，罗伯特·赫德不仅将自己视为英国人，而且也自视为爱尔兰人。不仅如此，正如理查德·奥利里所说，正是这一爱尔兰人身份使赫德在中国任职时能够如此务实高效。作为爱尔兰人即便在今天仍意味着一个复杂的宿命。在赫德所生活的时代，爱尔兰刚刚开始要求从英国独立出来，情况更是如此。即便赫德自称爱尔兰人，他仍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不同的称谓：英格兰人、英国人、北爱尔兰人。

尽管这一例子并不符合任何一种关于爱尔兰身份的单一模式，它却恰恰反映了一种多重认同观，这些认同有时是相互竞争的——这正是爱尔兰身份的特征。在爱尔兰民族发展这一关键性历史时刻，我们的共和国总统如同罗伯特·赫德一样，来自北爱尔兰，是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毕业生，她拥有英国和爱尔兰的双重国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异常复杂的身份认同感，面对正在形成之中的新的世界秩序，爱尔兰正以有能力、高效率的一员的面貌走进新的世纪。

我们已开始用多重性和开放性来重新定义爱尔兰身份，这一趋势日益明显。二十年前，许多人并不把奥斯卡·王尔德这样的





人物视为“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们在“谁是爱尔兰人”的问题上持有一种非常狭隘的观念。在学术界，王尔德关于自己身世的想法以及我们对王尔德本人所作解释的看法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今天，我们不仅将王尔德算作爱尔兰人，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其爱尔兰身份在他大量借鉴庄子（一位公元前4世纪的激进的中国思想家）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然而，关于“爱尔兰身份”的种种旧有的局限依然存在。例如，有人拒绝将世袭贵族和爱尔兰语地区（爱西部主要讲爱尔兰语的地区）居民相提并论，拒绝将他们视为真正的爱尔兰人。时至今日，在爱尔兰持此看法者的数量还有多少？我们只是将这些世袭贵族视为被殖民历史的遗迹而希望加以忘却，还是准备充分利用好比尔城堡的那些美轮美奂的花园，将其视为我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这些花园是帕逊（也称为罗斯伯爵）家族三代人共同经营的结果。帕逊是爱尔兰最古老的盎格鲁—爱尔兰家族之一，他们将中国的一些奇花异草归类定名，引入爱尔兰。第七代罗斯伯爵布伦丹·帕逊先生在本书中首次披露了这段在很大程度上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历史。

同样，爱尔兰传教士（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的历史给予我们关于“后天主教”的爱尔兰的新认识又有哪些？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正是爱尔兰传教士准备在中国做出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与热情”及其对殉道者英雄精神的崇拜成为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推动力量？他们将传教活动视为爱尔兰过去光荣的复兴，这些是否仍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部分？爱尔兰肩负着世界使命，尽管与中世纪初期向欧洲异教国家传播基督教教义相比，今天的使命包含了更广的内涵。

正如上述文章阐明的那样，将这些经历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寻求理解我们与他者（甚至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他者）的关系如何

能够成为认识自我的新途径。因而，在本书的系列文章中，中国可以起到一面镜鉴爱尔兰的镜子的作用。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 1983 年酋长乐队何以能够在访问北京期间事先未经排练就与中国民乐艺术家共同举行了爵士乐即兴演奏会。在该文中，陈慧珊博士将揭示爱尔兰和中国传统音乐表演方面的情况。

然而，如同真实生活中的镜子一样，我们获得的图像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芬坦·奥图尔的研究表明，19 世纪中期在美国的爱尔兰工人对中国同行充满敌意，最终导致 1882 年《排华法案》出台。受到民粹主义运动的影响，《排华法案》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获得通过的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排斥移民法案。

对于今天新一代中国移民在爱尔兰的境遇而言，这段历史又能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目前，一些研究报告表明，大多数在爱尔兰打工的中国留学生认为自己曾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种族歧视。这些报道又与我们的自我认知存在多大的距离？吕奥达安·麦克·科梅克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移民是全爱尔兰最分散、也是压力最大的新移民群体。从中国移民的经历中，我们是否有勇气自我反思，检讨自身是否正在重复过去种族歧视的历史？只不过这次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中国的这面镜子反映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言，爱尔兰的历史并不长，目前仍在致力于界定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国人眼中，爱尔兰是一个小国，政治上奉行中立政策。对许多人而言，我们为赢得独立所进行的斗争象征着与过去的帝国传统决裂。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我们也使用共和国的称谓。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两国对这一称谓有着各自的界定。爱尔兰人的共和国理想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和其后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在我们关于自己国家的定义中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等关键词汇，这些词语从我们的公共辩论到个人思考无处不在。